

《圣经》的文学性及其对中西文学的影响评述

袁秀萍

[摘要]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对《圣经》文学性的研究,牢固确立了《圣经》的文学经典地位。“圣经文学研究”历经研究“圣经中的文学”,到解析“作为文学的圣经”,内涵渐趋丰富。本文探讨了西方文学、中国文学与《圣经》内在而深刻的联系,揭示了《圣经》基督教对西方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圣经》文学性;影响;西方文学;中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99;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7)08—0186—04

作者简介:袁秀萍(1970—),女,瑶族,云南省楚雄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云南省楚雄师范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云南 楚雄 675000

引言

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对《圣经》这部西方文化典籍的文学特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国外学者运用现代文学批评方法对《圣经》文本的文学性作了比较深入的挖掘,出版了大量专著,甚至设有专门的研究杂志;国内研究者也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这些现象表明,《圣经》文学研究逐步兴起,渐成显学,是当代国际、国内文学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值得引起我们足够重视。

一、《圣经》的文学价值

《圣经》研究同《圣经》的历史一样久远,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没有人认为《圣经》本身有什么文学价值。不论是基督教徒、犹太人,还是世俗读者都把《圣经》文本看作形式上比较杂乱的一个集子,它包含了律法、家族谱系、历史故事、神话寓言、传说、诗歌等多种文类。就语言而论它也比较复杂,前后用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记述,又经过拉丁文和英文的漫长翻译和编辑历史,所以似乎无法谈及它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和特点。“《圣经》文学”(the Bible as literature)一词,最早由英国19世纪中期的著名诗人马修·阿诺德发明使用后,《圣经》一书的“文学性”引起现代西方学者的重视,研究者日众。19世纪中期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模仿:西方文学中描绘的现实》(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这部重要著作。虽然只用了第一章“奥德修斯的伤疤”来讨论《圣经》的文体,但他已经成功地揭示了《圣经》不仅是一部宗教和历史文献,它也是与荷马的《奥德赛》并驾齐驱的伟大史诗,被视为是“对《圣经》做出现代文学理解的出发点”^[1]。奥尔巴赫指出,“荷马风格”与“圣经风格”是西方文学史上摹仿、表现现实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艺术方式或传统。奥尔巴赫首次把《圣经》提升到与荷马史诗同等并列的高度来分析,确立了《圣经》的文学经典地位。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圣经》代表了与古典现实主义完全不同的摹仿风格,对后世严肃现实主义具有示范作用,人们可以从荷马风格/圣经风格、古典现实主义/严肃现实主义的相互对立、融合中把握欧洲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到《圣经》的文学独特性。自奥尔巴赫后,西方把《圣经》文本明确地作为一部文学名著的研究便逐渐兴起,吸引了无数对西方历史、文化、文学和政治思想理论有兴趣的学者。对《圣经》的文体、叙事特点、人物塑造、整体结构、修辞手段、隐喻和象征含义等进行深入探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并有独到见地的学者很多,其中最突出的是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罗伯特·艾尔特(Robert Alter)、梅厄·斯腾伯格(Meir Sternberg)、加布利尔·约斯泊维齐(Gabriel Josipovici)、帕特里克·格兰特(Patrick Grant)等。而后现代的文论家们也不甘寂寞地加入了阐释《圣经》的行列,比如米柯·巴尔(Mieke Bal)对《旧约·士师卷》作了相当深刻的女权主义批评,而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保尔·

利科(Paul Ricoeur)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也纷纷撰写了文章,用各自创建的理论来展示《圣经》的文学特色。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他们从《圣经》的文学性/历史性的二元对立、《圣经》文本的叙述机制和特点、《圣经》的文学整体性等几个方面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圣经》文学研究。

《圣经》的文学经典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首先,作为古代文化典籍,《圣经》是古代希伯来人和其他民族多种文化创作活动的结晶,蕴含着多种文化价值。像《圣经》这样的文化巨著,自然包含着文学艺术的创造成果。其次,以《圣经》为代表的信仰传统构成了欧美人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核心,在各个历史时期内在地制约着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各种形式的精神活动。文学艺术活动虽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也具备意识形态属性,自然也就无法彻底摆脱这种制约机制,只是在某些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中相对显著一些,而在其他时期则会隐蔽一些。但总体上看,这一影响的脉络一直绵延不绝。最后,《圣经》与《荷马史诗》一道并肩伫立在西方文学的发轫之地,“圣经风格”与“荷马风格”为西方文学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基本框架。《圣经》在体裁创新、人物塑造、叙述结构、修辞手法等方面都获得巨大成就,积累了成功经验。后世作家、艺术家从中汲取了作品“内容”方面的道德教诲和信仰熏陶,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在作品“形式”方面寻求灵感,从而不但从《圣经》中寻找创作题材,而且在形式技巧方面获益匪浅。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意义重大、富于原创性的哲学、宗教学、政治学巨著问世,但就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来分析,还没有一部作品对人们的文学艺术活动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有的外国学者强调,《圣经》中运用的大量文学手法并不是点缀,其功能并不是将一段贫乏、枯燥的论述变得富有说服力,而是用独一无二的方法表达了对生活的认识^[2]。弗莱认为圣经“既是文学性的,又能使自己完全不成为文学作品”^[3]。

二、《圣经》与西方文学

《圣经》对后世欧美文学的影响深远而巨大,但对于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不同作家而言,影响的程度和特点各有不同。“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必须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意义。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造就伏尔泰和尼采。”^[4]大致说来,自基督教被罗马帝国接

纳为国教至中世纪末期,它的影响是全局性和支配性的;文艺复兴以后尤其 20 世纪初期以来,随着文学的世俗化倾向日深,它的影响力相应减弱,但在历史名家名著中,它的价值观念和人格模式依然或明或暗地具有终极坐标或理想模型的意义。这是因为,《圣经》作为希伯来文化的基本经典,反映的大体是人的精神性、道德性或神性特征。学者们都共同认识到,“如果在后现代的今天还想要西方经典文学被读者们接受、读懂并欣赏的话,了解和熟悉《圣经》已是当务之急”^[5]。近世以来所翻译的大量的西方作家作品中,部分作家作品具有丰富的宗教性内容,如卢梭、但丁、莎士比亚、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创作所显示出的“灵魂的深度”正是现代作家所推崇和喜爱的审美力量。老舍把西方文学的宗教传统称之为“灵的文学”,“从中世纪一直到今日,西洋文学却离不开灵的生活,这灵的文学就成了欧洲文艺强有力的传统”^[6]。

文学经典既有自身的成就,也往往构成一种创作典范,对后代创作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决定着众多作家的艺术想象。在这方面,《圣经》甚至超越了《荷马史诗》,成为西方文学史上历久不衰的经典。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圣经》中的意象、人物形象、典故传说等在后世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成为后世欧美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之一。欧美作家在描述故事、塑造人物、构思艺术场景之时,经常会诉诸《圣经》。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具体的文本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具备强烈的讽喻功能;另一方面又应合着欧美人的“集体无意识”,通过接受者的联想或想象而与欧美人在基督教文化氛围内长期积淀的群体心理、意识联系起来。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产生了很多虽不是脱胎于《圣经》,但深受基督教义影响的作品,如早期日耳曼民族的史诗《尼柏龙根之歌》等及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亚瑟王的故事》宣扬了崇拜圣母、忠君护教的基督教思想。而许多作家直接以《圣经》中的人物、故事为素材进行创作。如弥尔顿的《失乐园》、《复乐园》和《斗士参孙》皆取材于《圣经》故事。班扬的《天路历程》几乎完全受《圣经》启示而创作,从头至尾穿插着《圣经》中的故事、词句和其他材料。此外《圣经》中无数流光异彩的文字、蕴义深刻的词句、美妙绝伦的故事以及各式各样的人物,长期以来一直成为众多著名作家引经据典的宝库。莎士比亚的戏剧也与《圣经》结下了不解之缘,莎翁本人的创作可以分为“喜剧、历史剧—悲剧—传奇剧”

等三个发展阶段,基本上符合U型结构。从人物原型来看,“基督—替罪羊”这一《圣经》中最为典型的人物原型多次出现于莎剧人物塑造中。许多悲剧主人公“他们运载着世人的罪恶,牺牲自己来达到救赎的目的,显示出一种崇高之美”^[7]。37个剧本无一例外地引用或化用圣经中的典故或语句,总计达500多处。透过这些表层联系,人们从莎剧中能不时发现各种圣经文化母题,诸如上帝、神意、崇拜、荣耀、博爱、宽恕、节制、怜悯、知足、自爱、祈祷、忏悔、罪、赎罪、恨、伪善、死、审判、魔鬼、末世、天堂、复活等。在更深的层面,莎剧还体现出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的完美融会,继承和张扬了希伯来精神,极力讴歌崇高的道德信念和仁慈博爱的人格。90年代以来,莎士比亚与《圣经》或基督教文化的关系日益引起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汪义群在《莎士比亚宗教观初探》中对我国莎学研究中流行的莎士比亚“反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说法提出质疑,尹振球在《论莎士比亚对基督教观念的反叛与回归》中也得出类似结论——莎士比亚对基督教观念的回归非但不是一种倒退,而且是一种超时代的前进。

在20世纪欧美文学的重要作家中,自称“英国国教式的天主教徒”的T.S.艾略特较早提倡用“神话手法”来创作。他在评价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时,指出“神话手法”可以给无秩序的现代生活带来秩序,而他的神话主要来源于《圣经》。有的研究者分析了艾略特诗歌创作中的“死亡与再生”、“寻找圣杯”、“火与水”、“赎罪与救难”等神话原型,认为艾略特成功地运用宗教原型,挖掘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在古代和现代之间建立起一个连续的平行结构,使作品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并且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象征意义,使其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8]。

由于《圣经》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最典型地表现为对作家作品的影响,不少研究者都由此落笔,以实证精神具体地探讨一批诗人作家如何借鉴引申圣经题材,汲取发扬圣经观念,写出不朽的传世佳作。如朱虹的《基督教〈圣经〉和〈简爱〉》、叶兴国的《劳伦斯与〈圣经〉》、邹溱的《〈老人与海〉中的圣经隐喻》、肖明翰的《福克纳与基督教文化传统》、何云波的《基督教〈圣经〉与〈日瓦戈医生〉》等。此外,也有论文追踪某些圣经形象在文学史上的嬗变,如梁工的《书拉密寻踪》和《简论该隐形象在欧洲文学中的演变》。也有的研究者认为“二战”后的西方小说中的人物和《圣经》人物存在着对应或影射关系,如怀特的《乘马车的人》的小说

题目即出自《圣经·旧约》的《以西结书》,暗示了小说精神折磨和赎罪的主题;戈尔丁的《塔顶》的主人公牧师约塞林综合了亚当、该隐和撒旦等三个圣经人物^[9]。这些研究《圣经》的著作采用的理论或方法几乎全部植根于后现代,他们用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或其它阐释学方向的理论高层次地对《圣经》进行了解读。

三、《圣经》与中国文学

基督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开始了它的汉语文化阐释时代。它与中国文化诸方面内涵——政治、伦理、教育、科技、大众传媒等都曾发生过或多或少的联系。我们这里所使用的基督教是取其以《圣经》为中心而形成的文化元典意义和语言形式。基督教对中国文学所产生的较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主要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随着近现代以来的教会学校的创办和留学生教育的实施,培养了一大批熟悉西方宗教和文化的知识分子,西学东译,尤其是《圣经》的汉译与传播扩大了基督教生存的社会公共空间,现代作家所拥有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个体生存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基督教的意义世界。这些都为基督教进入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可能。

一如在西方,在中国大陆,圣经神话也是最富魅力的话题之一。它的印迹清晰地镌刻在太平天国诗文,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闻一多的文论,鲁迅、林语堂、梁实秋、冯至的散文,冰心、徐志摩、李金发、陈梦家、艾青、绿原的诗歌,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苏雪林的浪漫派小说,许地山、茅盾、陈翔鹤、老舍、巴金、萧乾的写实派小说,以及田汉、曹禺、向培良的戏剧创作中。中国近现代作家从《圣经》中征引典故、选取素材、改写情节、化用人物、推演母题、再现原型、汲取灵感、生发意念,创作出各种带有圣经情结的著名作品。冰心把对宗教的感受转化为“童心”、“母爱”和“自然”,使宗教伦理化和自然化,融合了神性之爱与人性之爱,让爱的终极关怀所具有的纵向深度,向横向的平面展开。鲁迅一生的文章中,直接或间接引用《圣经》故事、典故、箴言达几十次,并常常引申出精辟的见解^[10]。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郭沫若率先使用《圣经》典故,在其新诗《女神之再生》中使用了“旧皮囊装新酒”的比喻。再以巴金为例,他对圣经题材的汲取、典故的运用以及词汇的引用多达63处以上^[11]。《圣经》的典型意象如伊甸园、十字架、马槽、鸽子、

蛇等流溢于艾青的早期诗作,在诗人的整个审美创造中实现了对《圣经》中的苦难意象、献身意象与光明意象的创造性转换。大体而言,对于中国现代作家来说,《圣经》的核心概念“上帝”和“耶稣”与其说是宗教性的,不如说是文化性的;圣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精神启蒙、人的文学和真善美极致的追求,以及对博爱人格和献身人格的弘扬^[12]。

不少中国作家根据自己的文学理解对《圣经》素材进行选择,并作了适当的调整、改造,借《圣经》故事传达自己的某种情绪与心声。如鲁迅的《复仇·其二》取材于《马太福音》;茅盾的《耶稣之死》、《参孙的复仇》取材于《福音书》和《士师记》;艾青的《马槽》取材于《路加福音》;徐志摩的《卡尔佛里》取材于《福音书》;冰心的《客西马尼花园》和《骷髅地》取材于《路加福音》。引用《圣经》原文或译文也好,化用圣经意象、句式和语气也好,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作家的创作动机、取材方式和文体风格。《圣经》就是这样通过中国作家的价值取向、情感方式和审美趣味,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

中文《圣经》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之一^[13]。《圣经》在中国的译介,主观目的虽然在于宣扬基督教,但在客观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各种《圣经》中文版本的流传,使中国文学家间接或直接接触到了圣经文学,中国学者和文学家们对圣经文学性的评介则促进了圣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现代作家积极寻求现代思想启蒙与救亡的价值资源,基督教文化所具有的现实批判与终极关怀,悲悯情怀与拯救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现代作家的价值需求。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圣经》的关注主要出自于精神的渴求、知识的兴趣和艺术的追求。圣经文学通过他们的价值取向、情感方式和审美情趣,影响到现代文学的文学语言、艺术风格和美学内涵,乃至影响到现代文学的整体风貌。

结束语

基督教和《圣经》是西方文学创作的重要渊源和文化背景。从西方文学的题材、情节和人物到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乃至文学批评和研究方法,都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全面渗透和影响,或者说,无论是西方文学思潮、文学运动和文学理论,还是涉及到作家的具体创作实践,它们都保留有鲜明的基督教和《圣经》印记。评价基督教《圣经》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

深度上都很难一言尽述,它们之间具有密切、深刻的共生关系。圣经文学研究在学术领域尤其西方国家的文学研究领域相应地占有十分显赫的位置。而中国改革开放 20 年来,不论对圣经文学本身的内容、观念、形式技巧、风格等的探讨,还是对《圣经》与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总之,《圣经》文学研究的崛起是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件大事。它的意义,首先在于把学术界长期漠视的《圣经》文学提高到西方文学源头的高度,从源头上客观地认识西方文学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其次,它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阐释和评价。这一切,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西方文学的发展和演变线索,对研究者热切期盼的“重构文学史”产生深远影响。但中国的研究欲汇入国际圣经文学研究的主潮,尚有一定的距离,但这方面的研究必定能克服各种困难而不断深入,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这是由圣经文学研究对于准确地理解世界文学发展史的重大意义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 [1] Robert Alter, Frank Kermode. The Literary Guide to the Bible[M]. Cambridge: The Belknap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3.
- [2] T. R. Wright. Theology and Literature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8: 4.
- [3] 诺斯洛普·弗莱. 伟大的代码[M]. 郝振益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90.
- [4] T·S·艾略特. 基督教与文化[M]. 杨民生, 陈常锦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205.
- [5] David L. Jeffrey.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in the 1980s: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M]. Tomoto: The University of Tomoto Quarterly, Vol. 59: No. 4, 1990: 570.
- [6] 老舍. 老舍文集(第 15 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444.
- [7] 肖四新. 《圣经》原型——莎士比亚创作的基石[J]. 外国文学研究, 1996, (1): 91-96.
- [8] 何江胜. 试论 T. S. 艾略特的神话原型[J]. 长沙水电师院学报, 1990, (2): 73-77.
- [9] 叶胜年. 准结构主义批评: 20 世纪西方小说若干隐喻模式探微[J]. 当代外国文学, 1996, (2): 134-140.
- [10] 梁工. 基督教文学[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 p401.
- [11] 胡绍华.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161.
- [12] 许正林. 中国现代文学和基督教文化[J]. 文学评论, 1999(2).
- [13] 邹振环.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6: 36-40.